



没有美国的欧洲

本杰明·罗德¹

编者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7月15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作为竞选搭档，这加剧了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和自身安全的担忧。欧洲安全秩序的存续严重依赖美国的支撑，而特朗普和万斯都主张美国从欧洲抽身。本期推荐的文章从欧洲历史的视角探讨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影响，供读者参考。

欧洲与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洲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区别在于二战后建立并在冷战后扩大的安全秩序的性质。欧洲安全秩序基于美国的力量和参与，而美国现在面临潜在的致命挑战。要充分理解这一秩序的意义，就要考虑欧洲历史其他方面的独特性。

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没有一个压倒性的霸权国长期统治西欧和中欧。近一千年后的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的残余领土。在这一千年，虽然西欧和中欧曾有过觊觎帝国遗产的国家，比如名不副实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确立了罗马帝国继承者的地位。欧洲在经济、技术和战略上基本停滞不前，欧洲国家在东亚、南亚和中东的大帝国面前相形见绌。

有观点认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正是帝国领导和政治统一的缺失激发了欧

¹ 本杰明·罗德 (Benjamin Rhode) 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英文原文登载于 IISS 官方网站: <https://www.iiss.org/sv/online-analysis/survival-online/2024/07/from-the-archive-europe-without-america/>。此为中文摘译版。

洲的内部竞争和活力，而这对欧洲最终崛起并称霸全球至关重要。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的五个世纪里，欧洲国家成功地奴役、殖民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还导致强大的新国家诞生。这些新国家后来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世界强国，其中包括美国。与此同时，欧洲本土几乎一直存在战争。

欧洲曾努力通过外交维护和平。1815年之后，“欧洲协调”之下的几十年相对平静。但这一体系在19世纪中叶崩溃，欧洲大国之间爆发了一系列重要战争。随后出现的所谓“均势”依托于发生灾难性的“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各国领导人都知道随时可能爆发战争。最终，这场战争在1914年爆发。

欧洲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在20世纪，欧洲的内部斗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映了一个欧洲强国的野心，即通过殖民和统治自己的大陆，与其对手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相抗衡。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如此。二战结束时，欧洲实际上被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本质上非欧洲的大国瓜分。

英国能够幸存并成为解放欧洲的跳板，要归功于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孤立主义使其无法在战争一开始就进行干预，但美国总统曾向丘吉尔寻求英国将坚持战斗的保证，他自己也保证华盛顿将协助欧洲持续抵抗。因此，丘吉尔在1940年6月承诺，即使本土被占领，大英帝国也将坚持下去，直到“新世界挺身而出，拯救和解放旧世界”。

接下来的45年，欧洲内部没有发生常规军事冲突，尽管从战略上看，欧洲的新角色是充当非欧洲超级大国博弈的棋盘。如果冷战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欧洲将成为超级大国的主要战场。如果超级大国冲突升级为核战争，欧洲将很可能被彻底摧毁。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战后西欧出现了新的安全秩序，该秩序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优势以及北大西洋集体安全理念之上。北约自然由美国主导，但很快，欧洲经济和政治共同体开始出现，它们与北约的关系在一些方面是互补的，在另一些方面则存在冲突。

虽然西欧国家有很多人，特别是左翼人士，对1945年后美国在他们国家的长期存在感到不满，但从未达到华约组织成员国大多数居民对苏联的仇恨程度。在后冷战时代，尽管苏联这一共同对手不复存在，美国主导的欧洲安全秩序却得以延续，甚至向东扩展。

一、欧洲的三难困境

统一、自由和安全可以作为分析整个欧洲历史的框架。从长期来看，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学家所说的“不可能三角”或“三难困境”：三个目标之间存在张力，往往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

例如，罗马帝国霸权带来的统一和安全伴随着自由或自决权的缺失。后世的欧洲各国或许享有了更多自由，但它们在政治上更为分裂，更不安全。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试图建立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本土欧洲安全秩序，强调加强合作甚至是集体安全，但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

直到美国“浪子回头”，欧洲才得以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实际上，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美国都在欧洲充当了一种历史上反常的非领土霸权。这与某些当代“现实主义者”所信奉的“离岸平衡”相去甚远：美国在欧洲维持着数十万军队，部署了核武器，并通过北约的集体安全协议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美国并没有占领或吞并欧洲领土，也没有推翻北约内部违背美国利益的政府。尽管如此，欧洲安全秩序无可争议地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经济实力）。

华盛顿扮演这一角色并非出于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而是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美国认为，维护西欧的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防止欧洲的内讧也是一项重要利益。美国不仅是抵御苏联威胁的保护者，还在暗中充当了欧洲内部和平的担保者。1989年后，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都对德国统一怀有严重的疑虑，美国的持续存在为两国提供了信心。因此，欧洲享有霸权存在带来的诸多安全优势，却没有遭受暴政或领土掠夺。

通过加强欧洲政治和经济联盟，欧洲在保持国家自由的同时，也朝着加强统一的方向迈进。但这对欧洲本土安全秩序的意义不大：欧洲的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美国。冷战后，从波斯尼亚到科索沃再到利比亚，欧洲及周边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军事上犹豫或无能为力的表现，需要美国的力量来解决。美国多届政府都提出了更公平地进行“责任分担”的要求，但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他们能够无限期地享受这个相对温和且开明的“利维坦”的保护。

“利维坦”离开后怎么办？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继续充当欧洲的安全保障者，欧洲还能继续享有统一、自由和安全吗？

二、乌克兰问题的严峻考验

拜登政府经常重申华盛顿承诺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以及通过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来保护欧洲。但这些承诺都取决于美国政治的变化，以及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对安全优先事项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欧洲在全球的重要性下降是难以忽视的事实——1990年欧洲国家GDP占全球的28.6%，而2019年仅占17.9%。美国已基本放弃在不同地区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抱负。如果美国希望在东亚的战争中获胜，那么它即便可以为其他地区冲突中的盟友提供军事装备，也不会自己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美国和世界面临着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这将对乌克兰和欧洲的防务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他不认同集体安全的理想。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向他的顾问们提议美国退出北约，而担任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宣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一定会兑现这一诺言。因此，欧洲人认为，相信美国将无限期支持北约可能会带来战略灾难。无论哪位总统执政，美国政治的波动都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而迫使美国将战略注意力转向亚洲的结构性压力也将继续存在。

欧洲再次面临边境安全威胁。与此同时，过去80年来欧洲的安全保障者正在威胁要撤出。一些人直到最近还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秩序的潜在合作伙伴，但至少在当前一代人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事件标志着对俄罗斯对抗性和掠夺性减弱所寄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欧洲安全秩序只有在排除并防御俄罗斯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一心想为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架构中保留一席之地，但在2024年2月，他公开声称欧洲的安全实际上取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马克龙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最近强调，俄罗斯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把对欧洲的攻击扩大到乌克兰以外。

重要的是，不要低估欧洲国家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欧洲各国都不想重蹈被占领和征服的覆辙，这意味着他们抵抗俄罗斯的团结和决心远比两年前许多人担心的要强大和持久得多。德国最初因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够而受到批评，但后来德国大幅增加了军事援助，并宣布在波罗的海国家长期驻军。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军事强国的加入增强了北约的实力，使普京遭受战略挫折。欧洲的国防开支进一步增加。乌克兰已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2024年初，当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一派的共和党人阻止了乌克兰急需的600亿美元援助时，欧盟提供了相近数额的援助，尽管是在未来三年内发放的金融援助。

三、无依无靠的欧洲？

欧洲由约30个主权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国土面积、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战略视角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很难在安全优先事项上达成一致。在美国“利维坦”的支撑下，这种不统一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但是，由于美国有可能在数月内而不是数年或数十年内撤出，欧洲最近鼓舞人心的言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行动还是未知数。几十年来国防投资的不足需要持续、大量的开支来弥补，同时，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模式成本高昂以及人口老龄化也对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压力。

在美国进入欧洲大陆之前，欧洲从未建立过可持续的本土安全秩序，使其能够兼顾自由、统一和安全。现在，如果没有了美国，欧洲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一个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不受到其他国家强烈抵制的、新的本土霸权国的出现。欧洲的安全合作可能越来越基于地理和安全观念的一致性，从而呈现出区域化特征。如果美国全面撤出欧洲，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离俄罗斯最近的国家）可能会开启获取核武器的进程。短期内，欧洲可能会努力发展核共享计划。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中评论道，“世界历史上人类状况最幸福、最繁荣的时期”是公元96-180年。这80多年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鼎盛时期，不仅是一个黄金时代，还是欧洲至1776年该卷书出版之时最为幸福的时期。同年美国诞生，后来成为安全提供者，使欧洲经历了一段相对统一、安全和自由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的幸福和繁荣远远超过了公元2世纪。也许我们遥远的后代会像吉本一样，认为战后——特别是冷战后——80多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只是欧洲漫长的血腥历史中一段短暂的异常时期，是一个早已逝去的黄金时代。

（陈丹梅摘译，归泳涛校）